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郝亚明

**[提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功能目标、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表明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尊重与遵循,彰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功能定位,设定了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构建的中心,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的指引。

**[关键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3—0009—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18BMZ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民族社会学。天津 300350

自2010年1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来,这一方针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之一。在此后的多次民族工作重要会议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再三强调。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其进行了扩展性论述,“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sup>[1]</sup>。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申,则标志着这一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中依然具有方向性和指导性意义。

在深刻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原则自身所具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所面临的争议与挑战。在中央未对“交往交流交融”做出明确理论性解说的背景之下,<sup>[2]</sup>有学者指出:“‘三交’理念自2010年提出以来,学界就如何解读其内涵、如何在实践中施行的问题上分别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sup>[3]</sup>在理论层面,一方面既有学者质疑“民族交融”概念在内涵上与“民族融合”存在交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提法容易引发学术争议与思想混乱;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作民族理论的转型,倡导构建以促进民族交融一体为目标的第二代民族政策。<sup>[4]</sup>在实践层面,一些地方出台鼓励族际通婚或族际混居的政策,也引发了“以政

策制度直接发力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反对人为推动交融一体”两种观点之间的论战。<sup>[5]</sup>

无论是从政策重要性出发,还是从现实争议性考量,围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一套完备的理论话语体系都极为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有理论话语无力支撑其实践重要性,才导致其现实争议性的长期存在。鉴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种政策指向,对其进行独立解读时难免出现价值导向与功能定位方面的模糊性,因此引入共识性、基础性的核心概念,在彼此逻辑关系的锚定过程中建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体系成为必然的选择。本文选择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建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体系,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紧密关联,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现实需要紧密契合;其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论述中的创新性与基础性地位,其立意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旨紧密契合。<sup>[6]</sup>基于此,文章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在多民族国家建设中为何要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理论上应如何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实践中应如何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目标

在中国的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多地被设定为一种行动导向而非政策目标。在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何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既产生了诸如“促进民族交融一体”的冒进思潮,也催生了所谓“推进民族人为融合”的保守认识。此种认知歧异的产生,大致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民族理论话语的固化影响。由于“民族融合”概念被认为带有民族同化与民族消亡的意味,导致其他带有“融”字的概念或提法在中国的民族研究学界中饱受质疑。这种情况不仅只针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交融”,甚至其他一些在多民族国家建设中被证明有着重要正面意义的政策与理论,如推进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合、社会融入等提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另一个更直接的因素则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种政策导向自身存在目标定位上的模糊性问题。同样遵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原则,可以达成多种多样的政策目标。在理论上,它既可以服务于单一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民族同化,也可以服务于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团结。因此,赋予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明确的目标定位,是其理论体系建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

那么,将何者设定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目标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sup>[7](P.40)</sup>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十九大报告的相关论述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向。这段论述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它们基本上锚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民族工作的主体内容。从本质上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行动导向,民族团结是一种社会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一种心理认同。尽管这三者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并非彼此独立的政策目标,而是有着紧密逻辑关联的理论体系。如果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作一种政策导向的话,民族团结就是这种政策导向的直接目标,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这种政策导向的根本目标。就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外在状态,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内在支撑。在整个逻辑链条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起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终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能够被视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目标,一方面是因其在新时代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中所居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还在于其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契合了当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与延续的基本需求。具体而言,这一根本目标的确立具有如下几点意义。

其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表明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尊重与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着紧密的理论与现实渊源,两者同样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必然无法超越或无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结构性基础去推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目标,表明我们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认识未曾改变,表明我们在尊重多元基础上凝聚一体的总体目标未曾改变。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不仅使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目标和功能定位更加清晰,也可以将民族交融与民族融合进行彻底分割,平息一些学者的质疑与忧虑。同时,鉴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间一脉相承的理论关联,也可以看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针提出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转型”的论断是缺乏学理依据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非要人为改变中国多元民族结构的现实,而是在尊重这一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必要举措。

其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彰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功能定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体意识一直起着凝聚与维持多元结构的作用。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在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之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当今时代面临着结构解体的危机,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对一体性的强调。如果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所深化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中存在对中华民族一体性与整体性的强调。<sup>[8]</sup>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目标,一方面明确了通过族际交往互动、相互学习借鉴、空间与结构上的相互嵌入等过程来构建民族交融团结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也驳斥了片面强调“分”而排斥“合”、强调多



元而否定一体的保守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心态。

其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设定了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族际交往对于民族关系的积极意义,但极少将其上升到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层面。在各民族人口频繁流动的“面对面”时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远超各民族“背靠背”的年代,其影响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进入到国家和政治的视域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在本质上更是带有政治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通过广泛而充分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必然路径选择。

## 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体系

进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构建,除了要回答“政策目标何在”之外,还要回答“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解决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功能定位问题。此时,论证如何通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手段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就成为理论建构的重心所在。这项工作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在实践中不理解或不注重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回应。尽管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从逻辑上将其拆分成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三部分,分析各自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功能发挥,对于其理论建构是极有帮助的。

民族交往的本质是社会交往,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起到基础前提的作用。持续而紧密的社会交往本身既是一个共同体存在的核心标志,同时也是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维持的核心要素。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sup>[9](P.532)</sup>也就是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社会这种人类共同体就不会形成。在民族结构多元的情境中,没有不同民族个体之间、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持续的社会交往,多民族社会将无以为继,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体意识。所谓民族交往就是族际之间的接触与互动,其对于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性作用有着坚实而广泛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例如,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指出,族际交往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缓解接触过程中的焦虑、产生共情等积极情感。同时族际

交往的这些积极效应还可以通过接触效果的泛化与接触方式的拓展而得到超乎想象的放大,整体性地作用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大局。<sup>[10]</sup>概而言之,民族交往是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由之路,并最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民族交流的本质是文化交流,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起到纽带连接的作用。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其内涵涵盖了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生活习性、宗教信仰、社会心理等广泛内容。传统视角下的民族就是共享文化特性的人群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56个民族的复合体也具有文化共同体的意涵。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态多样,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无论是对于共同体的正常运转,还是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都是不可或缺的。当前中国的族际互动中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停留在极为粗浅的层面,人们在对其他民族的认知中夹杂着大量刻板印象和想象性解读,对与本民族文化存在显著差异的文化事项缺乏应有的包容和尊重,其深层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民族文化交流的不足与不畅。无论是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sup>[11]</sup>,还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其所指主要是针对中国56个民族多元且差异性的文化。这些讲话既强调了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当前民族文化交流上的不充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各个民族精神文化聚合物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除了需要统一的物质基础之外,也必然需要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1]</sup>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然是在各民族文化进行广泛的交流互动、相互吸收吸纳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共性的文化基础,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纽带与连接。通过加强民族交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保障。

民族交融的本质是结构交融,它在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形成中起到结构支撑的作用。有别于将其与民族融合关联起来的错误理解方式,民族交融应该从结构交融的角度进行理解,它强调的是不同民族的个体、群体在社会结构上的相互渗入和彼此关联。社会结构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稳定模式,而民族社会结构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多民族社会中,民族关系的稳定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赖于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结构上的相互交融。西方学者在对一些多民族国家社会结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y)这一概念,以描述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之间在社会结构上严重断裂的场景。所谓平行社会,就是少数族群尽可能避免与主流社会在空间、社会或文化上进行接触,与主流社会形成互不相交的状态。<sup>[12]</sup>平行社会的出现是多民族社会结构断裂的重要标志,此时族际关联隔绝、社会凝聚缺乏、民族关系脆弱,是一种典型的与共同体或共同体意识背道而驰的社会状态。如果说平行社会表述的是多民族社会结构上的恶性状态,那么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则表述的是一种理想状态。所谓民族互嵌型社会结构,就是各民族通过频繁而有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共同体的社会形态。中国当前的多民族社会结构远未达到这一理想状态,例如有学者指出许多领域中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系统性的制度化区隔,并将其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sup>[13]</sup>。中央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其目的就在于“打破民族结构与其他社会结构的重合,使不同民族成员掺杂或嵌入到其他社会结构中去,从而为消除民族隔阂、实现交融创造条件”<sup>[14]</sup>。以其消解多元社会张力和构筑族际整合基础的基本功能,为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相应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动力。<sup>[15]</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交融的过程就是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过程。通过加强民族交融来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社会结构层面的支撑。

综合而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指引

作为根本目标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仅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构建的中心,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的指引。如前文所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政策原则具有行动指导性强而目标指向性弱的特点,名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可能无法达成预期效果,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有损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根本目标。因此,在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中,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指引是极为必要的。

首先,在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中,要避免本末倒置,造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就政策设计和学理逻辑而言,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之间,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前者是形式,后者是内容。然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高层次目标所具有的抽象性相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更为紧密,因而在实践工作中通常得到更多的强调,并成为大多数政策实践的抓手。这就容易导致人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独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其自身的实践目标。这种手段代替目标的认识偏差在实践工作中表现为,为了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加强族际交往、文化交流、结构交融的实践中遗忘或忽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心地位。可以想象,那些不顾条件、不顾基础、一刀切的政策行动,表面上看似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质上却可能有损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

其次,在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中,要消除片面认识,正确理解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意义。这些片面认识主要表现为怀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作用,忧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会导致多元民族文化的消逝与民族同化的产生。前者可能会导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中的消极、怀疑态度,后者可能会导致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中的保守、排斥心理。费孝通先生整合大量的考古发现、史料记载、语言学成果、人类学研究,对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凝聚核心的形成与发展、地区性多元统一基础上的大一统局面、民族间的大混杂大融合大流动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清晰完整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形成的历史进程。<sup>①</sup>其中一个根本性的结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直接目标并非追求民族之间共性的增加,而是民族之间纽带的增强。事实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目标,一定程度上正是试图将其与民族融合或民族同化进行彻底地切割和区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目标。澄清这一领域内的片面乃至错误认识,才能以一种不急躁、不冒进、不消极、不抵触的态度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

再次,在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中,要尊重客观规律,确保族际互动精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里的客观规律,一方面是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自身的规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涉及到复杂的人际群际互动、多元文化碰撞、社会结构重组等问题,在每一个方面都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存在,它们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基础,也是其必须遵循的客观制约。例如,族际互动受互动场景中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既可能发展成积极接触以改善民族关系,也可能发展成消极接触并恶化民族关系;<sup>[16]</sup>文化交流在起始阶段会引发文化震撼,在整个过程中都潜藏着文化冲突的可能;结构交融与群体排斥相伴相随,往往难以突破初级群体圈子的势力范围。诸如此类的客观规律都有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作为支撑,只有在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中对此有所认识、有所准备,才能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坚定、灵活、妥善地应对。另一方面的客观规律是指民族工作自身的规律。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无论是作为手段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是作为目标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自身都是一个多元复杂因素交织的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工作中,需要系统地规划、稳步地推行、广泛地实践、长期地积累,避免急功近利的做法与毕其功于一役的冒进思想。

最后,在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中,要树立目标观念,以是否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评判准绳。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通过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这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理论框架,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评价标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推动建立相互

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sup>[17]</sup>(P.73)在推行诸如此类旨在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工作时,要坚决摒弃从数量、形式、速度等方面来评价政策效果的错误做法。评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成败优劣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以中央和地方的一些积极政策实践为例,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全国各地进行参观学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推行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等。我们之所以将这些政策实践视为成功范例,就在于其通过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种方式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注释:

①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参考文献:

- [1]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29.
- [2]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J].学术界,2016(4).
- [3]杨须爱.“三交”理念提出以来的争论及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
- [4]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5).
- [5]陈永亮.关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思考[J].民族论坛,2014(12).
- [6]郝亚明.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9(1).
-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民族研究,2018(1).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J].民族研究,2015(3).
- [11]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30.
- [12]Mueller C. “Integrating Turkish Communities: A German Dilemm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Vol. 25, No. 5, 2006.
- [13]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3).
- [14]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J].学术界,2016(4).
- [15]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
- [16]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J].民族研究,2015(3).
- [17]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收稿日期 2018-12-10 责任编辑 李克建